

東西文化 勢將會合



東西方關係進入新紀元，而標誌着這個新紀元開始的，不單是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消失，也包括了冷戰的結束，共產主義及反共產主義對壘陣營的瓦解，曾因冷戰而分隔的人類再次會合。這些改變還包括東亞經歷的蛻變，以及自西方航海探險以來，東西方關係面臨的最大改變。工業革命帶來了東西方在科學及技術上的差距，造成西方在過去數個世紀佔到優勢，但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已先後迎頭趕上，而今天中國及東南亞的國家亦正在急起直追。

在新的現實環境中，東西方必須重新界定彼此間的關係，其中最重要又最困難的莫過於界定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而中國急促的轉變及西方對這種變遷的回應，正不斷塑造兩者之間的關係。



當代的一個最大難題，就是如何由社會主義轉變到市場，令這些優越條件得以展延開去。相比俄羅斯、東歐及北韓呆滯不前的經濟，中國的改革異常成功，以極快速度，帶來各種好處，這出乎於一般人的想像。

* 本文根據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第四十四屆頒授學位典禮(1992年10月15日)提供的講辭摘編而成。承作者同意刊載，謹此致謝。

西方人看着這個轉變，稱讚其中他們認為與自由市場及民主社會吻合的改革，不吻合的卻被他們譴責。因為他們對政治過程有一套觀點。他們不熟悉中國，認為鄧小平推行經濟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但他們錯了。事實上，中國已經推行了一些很重要的政治改革。鄧小平訂下了政府官員的年齡上限，從而馬上清除了國內很多不稱職的高級幹部。中國的大學再設入學試，政府人員的提升也加入學歷的要求，於是政府服務水準提高。鄧小平又推行政黨組織與日常行政分家，讓能幹的專業管理人員能更靈活地施政。無疑，共產黨仍然掌權，但這個曾經推動毛澤東式革命的政黨，現正推行經濟現代化。這個政黨已經迅速適應其新角色，提供了一個行政架構以促進改革及經濟發展。

這些成就就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國家要鼓勵官員支持改革，但又不能給他們滿意的薪酬，領導人唯有容忍官員追求個人利益，甚至構成貪污。為求加快經濟發展，中央及地方的官員容許狹隘的物質利益的追求。這樣就削弱了儒家傳統所重視有關人與人之間的融洽，以及個人對家庭及社會的責任感。中國在過去百年，受到內亂蹂躪，急於維持國家秩序的統治者，曾經將一些他們認為有威脅性的同胞殺害或囚禁。他們重視政治的穩定多於對個人尊嚴及基本人權的關注。不管在中國或海外，很多人對這些行為不表贊同，也對受害者深表同情。

令人遺憾的是，一些西方人為表達他們的義憤，要求制裁中國，將所有中國人，包括那些努力與外界接觸及試圖引入民主、促進人權的中國人，一併孤立起來。在我看來那些想孤立中國的人，並未深入認識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歷史：當中國對外越封閉的時候，正是其人民受到最大壓迫之時。這等人士也沒有顧慮到，離棄那些曾經為促使國家開放而冒着喪失事業、甚至生命的中國人的道義問題。

隨着中國的經濟增長，北京的領導人不單願意讓人民享有更多自由，也計劃在國際事務上扮演一個較重要的角色。但經過三十年與外界隔離，中國的領導人不容易理解現今世界的微妙問題。雖然他們經常公開聲稱中國不會扮演超級大國，但他們卻開始向俄羅斯購置軍備，增加國家軍事開支及擴大核子武器試驗。由於國家對能源需求日增，中國開始在仍然備受國際爭議的南沙群島一帶勘探石油。這些行動使中國在贏取亞洲以至西方國家的友誼時構成困難，而許多中國領導人對國際事務的觀點仍囿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形勢。中國必須不斷與外界接觸，才能建立互相信任，才能和平解決各種糾紛。

日本、南韓及台灣的經驗令人鼓舞。當她們的發展已達到一定程度的物質水平，就有一大批中產階級湧現，他們受過高深教育，經濟條件優越。在這些社會，以及在中國各地，有越來越多人，一如西方的知識分子，尊重真理，相信個人尊嚴，支持自由開放的經濟，堅信政府要對人民負責。作為一個學者，我們因世界各地的大學都在培植這些價值觀而感到欣慰。要知道西方與東亞有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人權及民主，我們不能期望這些差異完全消失。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努力去加強東西方互相了解，既能建立一套相通的價值觀念，

也能尊重彼此間不同的見解，在這基礎上開拓亞洲與西方關係的新紀元。

英國詩人吉卜林說過：「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雙方不可能會合。」但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東西文化會合融和是指日可待的。

傅高義(Ezra F. Vogel)
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期待更高的綜合

陳伯海

作為一個文化人，從思想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我所期待於二十一世紀的是甚麼呢？要說清這一點，不能不稍作歷史的回顧。

眾所周知，十九世紀是人類思想文化進程上的一個輝煌時代，它把前此數百年間人類創造的精神文明作了一番綜合，諸如唯理論與經驗論、現實主義與邏輯主義、人文思想與科學思想、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類矛盾傾向，在它那裏都得到合理的繼承與發揚，連結為一個整體，於是十九世紀成了人類文明演進的高峰。